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与演变*

张亚光 毕悦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学科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自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概念经历了多种译词并存的混用阶段、对“经济学”概念的借用阶段、受到学术分科体系影响的化用阶段,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术语演变路径,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演变的溯源,为理解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并立格局、探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概念史 近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一、引言

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大量西方经济学术语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政治经济学”一词也逐渐作为英文 Political Economy 的对译词被固定下来。但这一译法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简单视为两个英文词汇的分别直译,而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演变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就是政治经济学科在近代中国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

外来学术概念的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问题,“更多是不同文化间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①因此历来受到思想史学者的关注。就“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翻译问题而言,已有两类研究与之密切相关。一是“经济”(Economy)或“经济学”(Economics)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研究。叶世昌、叶坦等学者将自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种种中文译名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当属于此类研究的最早尝试。^②此后学者从多个角度解释了“经济”概念何以从种种译法中被选中并定型。方维规认为,“经济”一词之所以经日本转译而被中国人接受,是因为它既包容了古典经济学中政治和经济的原初含义,又顺应了19世纪以来“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由词组简化为单词的趋势。^③而按照冯天瑜和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经济”概念在中国的最终定型与社会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当社会价值取向从义利并重、重义轻利转向实利主义,“经济”一词也就脱离了原本的道德范畴,可用于指代纯粹的市场和商业活动。^④刘群艺通过梳理梁启超对“经济”一词译法的变化历

[作者简介]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副教授、研究员,北京,100871,邮箱:het@pku.edu.cn。毕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邮箱:biyue2015@pku.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批准号:15ZDB131)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② 叶世昌:《经济学译名源流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③ 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④ 冯天瑜:《“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程,认为其中的核心脉络在于梁启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对国家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取舍,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微观视角。^① 上述研究的共同结论是,“经济”或“经济学”概念在中国的确立,一方面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打上了日本、苏联等“中转站”的深刻烙印。

二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的溯源和演变研究。这历来是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的经典命题。近年来,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兴起,以及“政治经济学回归”理论趋向的日益鲜明,这一话题再次得到了学人的广泛关注。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梳理从前古典、古典到新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经济学”概念取代的主流趋势,回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新政治经济学的崛起历程,兼以评论当前存在的几种“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② 与上述研究相比,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探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产生和演变不仅具有一般的学说史意义,还具有以下两点特殊意义:其一,从概念演变的总体趋势来看,西方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化,而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提法的出现却晚于“经济学”,这种相反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该学科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发展规律的异质性,对于探讨当今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具有重要价值。其二,从概念自身的独特价值来看,政治经济学在当今欧美经济学界仅仅作为经济学的某一个或几个分支学科的代称存在,但在中国却代表着与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另一主流研究范式,而要探讨这一独特的二元并存范式产生的历史原因,就要上溯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

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产生和演变的历程出发,着重回顾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后经历的混用、借用、化用等阶段,成为英文术语 Political Economy 的固定对译词;随后通过正名、分化等阶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紧密联系的过程。最后,本文还就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做了简要评论。

二、“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的产生和演变

一般认为,英语中的“政治”和“经济”均来源于希腊文。“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城邦”(πόλις),指代城堡或卫城;城邦制度建立后,该词专指城邦制度下公民参政议政行为和权利的全部总和。而“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家庭管理”(οἰκονομία)。色诺芬最早在《经济论》中使用了这一概念,描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③ 亚里士多德基本继承了色诺芬的定义,聚焦于家庭管理中的致富术,又将其扩展到了城邦管理中。在《政治学》中,他阐明了这种扩展的自然性和必要性:“一种形式的团体——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初级形式——便是‘村坊’(κώμη)。……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文中的“经济”词源不仅包含家政管理的微观含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城邦管理的宏观意义,但后者毕竟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阐述政治思想时隐晦表达的意味,“政治”和“经济”二者在词源上仍然具有显著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个语词的矛盾,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切,按定义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务。”^⑤

这种词源内涵上的矛盾在16—17世纪得到了暂时搁置和容许。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

① 刘群艺:《“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翻译及其经济思想解读》,《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② 代表性成果包括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蔡继明、王成伟:《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兼评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2012年第9期。

③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7页。

⑤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演进,重商主义被视为富国强兵、积累财富的思想工具,逐渐活跃于英法等国。在该思潮影响下,国家通过直接支持对外贸易、增加外贸基础设施、提供政策干预等政治手段,创造和保障财富;商人群体则出于开拓市场、寻求国家庇护的目的,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愿。^①“政治”和“经济”因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借《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②一书,说明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张,使“政治经济学”一词首次见诸经济文献。这无疑这一概念在西方流变历程中的关键性事件,借助语词组合,直接阐明了“经济”在古希腊词源中所暗含的宏观意味,从而显著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现实适用性。

不过,受限于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蒙克莱田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位仍限制在皇室或君主自有产业的经营上;且在其之后,“政治经济学”一词意外地错失了思想界的关注,沉寂长达百余年之久。因此门格尔认为,这一概念并不表征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而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灵感的产物”。^③熊彼特甚至将该书贬为“平庸之作”,认为“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十七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并且因此使他的著作谬蒙不朽之誉”。^④但无论后继学者如何评价此书,蒙克莱田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开创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1767年,斯图亚特写成《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引入英文文献。^⑤与蒙克莱田所处的环境不同的是,斯图亚特能够将政治经济学从农业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君主自有产业的经营扩展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这为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概念得到正式的学理化阐述和明晰,是在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中。该书第四篇以“论政治经济学体系”(Of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命名,并以九个章节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家商业、进出口贸易、殖民地经济上的体现。斯密还在书中明确定义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任务所在:“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⑥在以上表述中,斯密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学服务的两个主体,即人民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均指向群体,且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反映了其学说虽然更加强调“经济”属性,但仍表现出与前古典时期学说之间相当大的承继性。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概念虽然在17世纪就已见诸文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却是在近二百年后。1805年,马尔萨斯在东印度公司学院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也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之间的漫长时滞,恰恰反映了“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出现有其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从现实背景上,源于新兴民族国家捍卫政权和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迫切要求;从知识背景上,则是17、18世纪时西方尚未完成学科分工,许多学者往往横跨多个知识领域,作为国家治理术出现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更是相当模糊,因而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当时“原初的社会科学”^⑦的代名词。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得以诞生、“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在词源上矛盾的概念得以共存的重要原因。

① 萨伊认为,在其之前的某些经济学家“把良好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根本原则混在一起研究”。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页。罗宾斯也指出,在重商主义的早期文献中,大多都是关于贸易法规、铸币制度、济贫赈灾等具体问题的策论。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陈尚霖、王春育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页。

② A. de Montchretien, *Traite de l'conomie politique*, Paris: Pion, 1889.

③ 转引自冯文光:《法国克拉姆谈“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历史》,《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3期。

④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页。

⑤ 参见朱巧玲:《有关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几点思考》,《改革与战略》2012年第9期;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⑦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王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言”第1页。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穆勒等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细化阐释,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试图剥离其中包含的具体政治环境,凸显研究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如西尼尔表示,“那些号称政治经济学家的早期作者所公开谈论的并不是财富,而是政治”,“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只是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①穆勒则更明确地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性和个体性,认为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社会状态修正后的整体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人的整体行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拥有财富的个人”。^②

尽管古典经济学的部分学者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去政治化”倾向,然而直到边际革命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速度才明显加快。对于这一概念变更的原因,杰文斯曾给出详尽的解释。一方面,边际革命的核心目标就是将经济学打造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经济学”(Economics)与数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在名称上具有词形的统一性。^③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双名也较累赘、不够简洁。但对此,杰文斯并没有展开说明。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累赘”是指在杰文斯的时代,“经济”一词已经脱离了原初的家政管理内涵,自然而然地与国家、社会等宏观范畴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不必再施加限定。^④但倘若仔细考察政治经济学自李嘉图以来发生的抽象化转变,此种解释就颇显牵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边际主义学者的努力,都是将经济学中的国家、社会等环境分解成微观个体的决策,与斯图亚特、斯密等最初倡导的富国裕民理念大相径庭。因而杰文斯所谓的“简洁”更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简洁,更进一步地,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两个矛盾的单词最终“松绑”。1890年,马歇尔出版脍炙人口的《经济学原理》,^⑤将这一简化后的经济学概念正式确定下来。自边际革命以来的经济学“去政治化”倾向,不仅仅意味着学科核心术语的重大变迁,更反映了经济学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转向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学科定位的转变,从而使其“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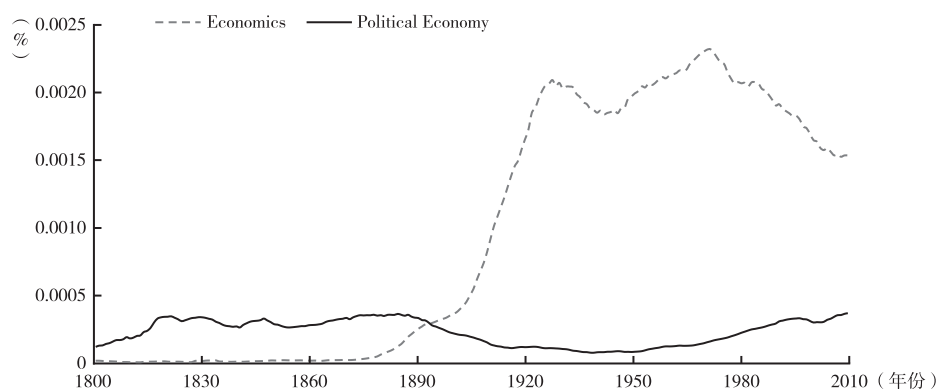


图1 Political Economy 和 Economics 在英文出版图书中的出现频率

说明:本图数据来自“谷歌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 Viewer),检索范围涵盖1800年至2019年正式出版的全部英文图书。

①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页。

② 约翰·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张涵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2页。

③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页。

④ 赖因哈特·科塞雷克等编:《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斯图加特1997年版,第583—584页,转引自方维规:《“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⑤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0.

⑥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第2页。

至此,西方学界完成了“经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转变。据图1的统计,1900年前后,“经济学”在英文图书中的使用频率开始超过“政治经济学”;20世纪20年代后,前者的出现频率更是大大增加,并最终取代后者,成为术语的首选词汇。尽管自20世纪中叶起,新政治经济学以公共选择、集体决策、产权理论等面貌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但这些理论的核心仍是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所铺设的基本框架。“政治经济学”这个带有矛盾性的词组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历史的选择,而一旦现实和学术条件发生变化,其不兼容性又会再次暴露出来。这或许能够解释这一概念在西方学说史上的尴尬处境,即政治经济学原本是为扩大和延展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而出现的,然而最终却变成了经济学的分支领域而退居次要地位。

三、“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出现

与西方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并不是从中国本土的知识框架中自发形成的,而是在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碰撞中逐渐出现和定型的。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界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译名的取舍创新上,这一过程既受到了“原生地”即西方知识界的直接影响,也包含来自邻国日本的“中转”效应的影响。

(一)混用:多种译名并存

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最早被引入中国,^①得益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然而与经济学面临的处境相似,传教士最初很难为“政治经济学”概念找到一个准确的对译词,于是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术语混用阶段。西方传教士的译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富国论。求富求强是近代中国引进西学的主线需求,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的手段论,到“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③的目标论,都体现出有识之士希望摆脱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迫切心理,因此这类译法也成为这一时期传教士的首选。近代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学译作《富国策》(京师同文馆1880年印刷)由传教士丁韪良、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合作完成,其母本是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译本在《凡例》中申明了选用这一译法的潜在原因:“富国策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无一夫失所”,“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④采用类似译法的还有《富国养民策》(海关总税务司1886年印行)和《佐治刍言》(江南制造局1885年印行),前者译自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后者译自钱伯斯兄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些译法的共同特征是,以富强、富国、治国等字眼为核心,以论、议、策、言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结构为呈现方式,生动反映了传教士在引进西学过程中对中国富强目标的透彻理解和对传统思想与学术体系的深入挖掘。

第二种译法是裕民论。如《佐治刍言》虽然在标题上采用了上一译法,但在正文中又将“政治经济学”译为“理财”“财用”等字眼;而近代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翻译教材《华英翻译捷诀》(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中亦将其译为“理财学”“生计学”。这类译法看似下沉到了微观个体的决策层面,实质上仍是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延伸,与上一译法是殊途同归的。

第三种是音译法。此种译法一般少见于译著或辞典,而以游记或新闻报道等为多;且往往不作为正式的对译词,仅仅用于一时一地的指代方便。如严复在《原富》例言中写道:“计学,西名叶科诺

①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早接触到的应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在汉语中的种种变体,而不是“经济学”。如上文所述,直至19世纪后半期,杰文斯、马歇尔等才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转向“经济学”的简化观点;从词频角度看,20世纪“经济学”的使用频率才开始大大加快。而上述时间节点远远晚于中国接触到西方近代学术的时间。若考虑到中西文化传递上的时滞,则当前学界所考证的对“经济学”的种种译法,实际上许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译法,或至少这两个译介过程是浑然难分的。

② 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③ 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④ 亨利·法思德:《富国策》校注,汪凤藻译,张登德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页。

密,本希腊语。”^①这里的音译法与《佐治刍言》中偶见的“伊哥挪谜”本质上无异,且同样被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翻译中,清朝外交使臣刘锡鸿在日记中记载向西人求教“播犁地家儿伊哥那密”(Political Economy)之事即属此例。^②此译法虽简便,但存续时间也最短。究其原因,音译传递出的信息与“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并无关联,违背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中名实相符、望文生义的基本遵循。

在这一阶段,维新派对推动政治经济学传播所做出的贡献亦不容忽视。与其政治主张类似,维新派在寻找“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对译词时表现出了相当的纠结和审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新旧、中西学术体系碰撞时的共同窘境。严复先是将“政治经济学”译为“理财学”,认为“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③“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④后又自感理财为“客观之说”,有“以客界主”之嫌,^⑤故更正译名为“计学”。在《原富》的《译事例言》中,严复曾详细说明了“计学”译名的产生原因:“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⑥由此可见,严复对政治经济学从希腊词源的“家政管理”到斯密的“富国裕民之学”的扩充历程非常熟稔,这也是他选择“计学”作为对译词的重要原因。然而梁启超对这一译名并不完全认同。对于“理财”,梁启超认为不能以动词来命名学科;而对于“计学”,他则认为此译法太雅,且与统计学相混淆。^⑦最终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梁启超选用了“生计学”的译法,但是他本人也表示这仅仅是一种权宜后的暂时选择,并坦陈:“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⑧

综上所述,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传入中国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其对译词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上都迎合了两种取向,即中国近代以来救亡求富的现实取向和自古以来的价值取向。前者自不待言,而对后者亦应投入足够的关注。无论是传教士还是维新派,在译介西学书籍时都面临共同的困难,这不仅来自于中西语言体系之间的鸿沟,更在于学术体系的差异性。晚清传教士林乐知曾在《万国公报》撰文指出:“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移译。”^⑨为增强新理论、新概念的可接受性,译者最优的取材资源自然是传统学术体系,因而无可避免地要用多个旧词来“拟合”新词。加之19世纪中叶同文馆等机构采取的译介方式多为传教士口述与中国人笔译相结合,而“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⑩故多数译名都具有极其浓厚的中学色彩。铃木在阐述日本经济思想演变历程时提出,在外来观念传入并与本土思想传统碰面的初期,与其说是融合,“倒不如认为明治以前的经济思想传统提供了一种决定明治以后被广泛接受的西方思想类型的框架,以及日本学者用以理解这些思想的方法更恰当”。^⑪这一论述对于近代中国接受“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历程同样适用。

(二)借用:从多种译名到“经济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有识之士对政治经济学内涵和理论的了解日益深入,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演变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即使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也没有顺利地登上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著中,“经济学”成为了Political Economy和Economics的共同译名,也即

① 严复:《译事例言》,亚当·斯密:《原富》(上),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② 刘锡鸿著,朱纯、杨坚点校:《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0页。

③ 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⑤ 严复:《〈国计学甲部〉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848页。

⑥ 严复:《译事例言》,亚当·斯密:《原富》(上),第7页。

⑦ 《问答》,《新民丛报》1902年第8期。

⑧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民丛报》1902年第7期。

⑨ 林乐知著,范祎述:《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904年第184期。

⑩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7页。

⑪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页。

“政治经济学”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表述。从源头上讲,“经济”译名并非近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亦不能称之为完全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典籍名词的新用。据已有研究考证,“经济”一词最早出自《晋书·长沙王义传》:“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①此后许多典籍中也出现了“经济”字眼,但大多取“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古义,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并不相同。

在此背景下,日本作为西学“中转站”,实现旧词新用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日本是与中国身处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邻国,又开风气在先,自然成为有识之士汲取思想素材的重要来源。自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起,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意愿就日益高涨,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务求早日抵达东京”。^②留日期间,他们翻译了大量由日本学者写成或转译的西学著作。有的学生借助“和文汉读法”,“在日本书上钩钩勒勒,不再另纸起稿”,^③对日文原著的阅读和翻译可谓信手拈来,这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动力。1903年,留日学生王璟芳撰文指出,Political意为治理,包括大至国家、小到村社的各种团体理财之政;而“经济”古义为经世济民、富国强兵,亦有理财之政的含义,故“日本径以经济二字,译英语之Politicae(笔者注:原文如此)Economy,夫既明二字[字]沿用之新义,则此中之包含,可得而进论焉”。^④1908年,朱宝绥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麦克文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标题译为《经济原论》,^⑤证明了在日本的深刻影响下,这一时期“经济”已成为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借用词。

事实上,在术语混用阶段,“经济”译名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然而许多学者对是否采纳其显现出相当的犹疑和挣扎。陈焕章就曾表达过对“经济”译名的不满,认为“它通常指政治才略,涵盖政府行为的全部,它更多地属于政治而不是经济”。^⑥梁启超也认为“经济”译名具有不妥之处:“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⑦既然经济的古义与西学中的经济学内涵存在巨大张力,那么这一译名又缘何在1905年前后作为Economy和Political Economy的固定对译词而推广开来?^⑧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价值向实利主义的转型,“经济”概念也被从经世济民的大义中解脱出来,用以指涉社会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⑨然而事实上,文化传统的转向并没有那么迅速。1896年,《时务报》刊载古城贞吉翻译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内容时,采用了“经济”一词,但同时附加小字“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⑩1904年清政府《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描述大学科目时也使用了“经济”的字眼,同时亦审慎地加入了限定词,表述为“日本名理财学及经济学”“日本名为经济史”等。那么,导致中国知识界最终接受这一译名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经济”是中文的原有词汇,并非舶来或新造,更易被国人接受。这应验了林乐知的观点:“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⑪然而这个解释未能正视“经济”一词古义和译

① 《晋书》卷59《长沙王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3页。参见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③ 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134页。

④ 王璟芳:《普通经济学(续第一册)》,《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⑤ 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4页;《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⑥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⑦ 《问答》,《新民丛报》1902年第8期。

⑧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91页。

⑨ 冯天瑜:《“经济”辨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⑩ 古城贞吉译:《日本名士论经济学》,《时务报》1896年第14期。

⑪ 林乐知著,范祯述:《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904年第184期。

义之间的冲突,简便、易传播也未必是知识分子在斟酌术语时首要考虑的因素。^①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一词的古义恰好与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所接受的西学内容达成了一致。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经济学不仅包括当时风靡于欧美的新古典经济学,还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而后者甚至更为国内学界所瞩目。要阐明这一“厚此薄彼”现象的原因,不妨首先考察“中转站”日本的情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日本学者也常将“经济”一词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所谓经济,就是经营国土、开发物产,使国家富饶和救济万民”,故对统治者而言是“不可须臾懈怠的任务”。^②在此文化背景下,日本学者虽然广泛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但对倡导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十分关注,却对强调国家保护主义的历史学派、社会政策学派表现出高度热忱。^③

日本拥有独立的发展环境,尚且不免倾向于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而面对更深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学者更是选择性地吸收了更符合传统文化土壤的西学。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序言中明确提到,自己参考了英格拉姆的观点,而后者正是呼吁在英国建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在由陈昌绪翻译、南洋公学1903年出版的《计学平议》中,经济学家被清晰地划分为新旧两派,分别指代英国学派和德国学派。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异端经济学尖锐批判了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愈益强化的放任主义、个体主义和抽象主义,契合了“经济”的古义和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目标、使命的潜在构想,可能正是推动“经济”译名成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借用词的关键原因。

(三)化用: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至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政治经济学”概念才逐渐摆脱了以“经济”或“经济学”为借用词的过渡阶段,以独立姿态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术语体系中。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概念并不是由学者直接倡议提出的,而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调整,首先出现在高等教育的学科门类中。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受到了日本、欧陆的深刻影响,而后二者的共同特点是视政治学和经济学二者密不可分或有从属关系。^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产生更是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分科制度直接相关。1882年,早稻田大学(时称东京专门学校)首创政治经济学科(政治经济学科),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置于同一部门之下。按照其创始人之一高田早苗的解释,这两个学科具有相似的宏观思维,同时都致力于解决构建现代国家的核心命题,因而具有天然的相关性。^⑤从课程设置来看,政治经济学科既开设行政学、外交学、宪法学等政治类课程,也开设经济原论、公共财政等经济类课程。^⑥1905年,早稻田大学设立清国留学生部,开辟了“政治经济学”概念传入中国的捷径;此后,李大钊、彭湃等人先后就读于该校政治经济学科,高田早苗更是与张之洞、梁启超、袁世凯等均有直接接触,其著作还被译成中文出版。^⑦

① 严复就曾尖锐地抨击了从日本舶来译词的风潮,认为日本接纳西学不过几十年,“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1页。

② 佐藤信渊「经济要録」滝本誠一編『日本经济大典』第18卷岩波書店,1977年,522页。转引自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9页。

③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65、71页。

④ 例如欧陆所谓的政治学涵盖了经济、法律等学科,极富实用色彩,德国甚至不设政治学分门,因为“德人之观念,政治无他,不属于经济则属于法律”。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日本则将政治学的应用研究划分为泛论和各论,其中前者为政策原论,后者包括经济学之政策论。参见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綱』上卷 博文館,1903年,13—20页。

⑤ 高田早苗「大学としての政治学経済学の過去を顧みて政治経済学部の使命に及ぶ」『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第1号,1926年5月,11页。

⑥ 参见早稻田大学大学史編集所編『早稲田大学百年史』別巻1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0年,13—14页。

⑦ 参见孙宏云:《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日本将政治学 and 经济学融于一体的分科思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在原有的法科下增设经济学门,与政治学门、法律学门并立。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县知事选拔任用条例,规定满足所列六条要求之一即可参加考核,其中涉及“法律政治经济之学”修读经历的占半数,^①高校学科设置对社会人才选拔和政务运行方面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不过,学科虽分立,但学问密不可分。据1916年《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当时的经济学门中不仅包含经济类课程,也包含许多法律类、政治学类课程。^②这暗含了时人对经济学的普遍看法,即法学和政治学应是经济学科的知识基础。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首倡“裁科设系”,但将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仍列为同一组别。至此,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科体系已与现今情况非常相近,纵观整个过程,不难看出政治学和经济学始终是紧密交织、同向同行的。

在学科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概念逐渐出现在时人的研究和时事讨论中。由图2可知,就《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两大报刊而言,自1912年起,“政治经济学”已现报端,但频率不高;至20世纪20年代后,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从内容上看,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历程的介绍。如龚自知翻译英国学者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时指出:“政治经济学者,研究财富之性质及其生产交易分配之方法之学也。”^③冯树华的《政治经济学之研究》^④和蒋宗昌的《经济学之由来与其意义》^⑤则详细介绍了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流变,后者还特别提到,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孟雪夫(即蒙克莱田)。第二,对国内政治经济学者的相关介绍。1916年,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张君勱讲授欧战状况,介绍其“为政治经济学大家,平时精研所得,每应时事之需要,发为正当之主张”;^⑥1924年,国民党召开实业演讲大会,介绍主讲嘉宾邵元冲“专心于政治经济之学,深思博学以大成”。^⑦上述两人均曾赴日留学,张君勱还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第三,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时事中。如讨论中国财政状况时,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关键不仅在税基,更在制度,“省自为政之积习,一日不改,则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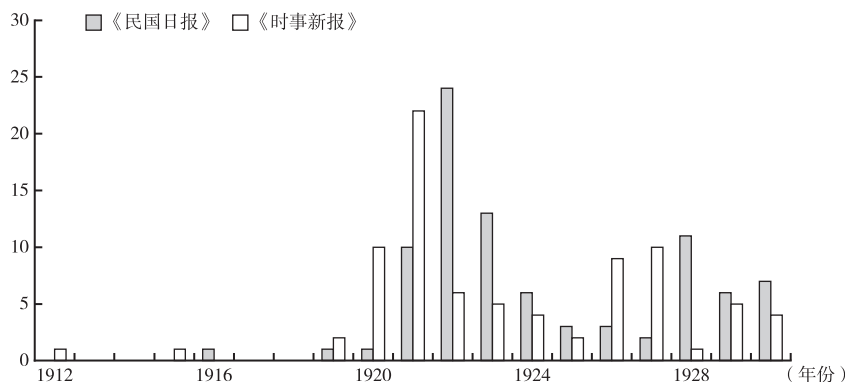


图2 《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中“政治经济学”的出现频次

说明:本图数据来自“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范围包括1912—1930年发行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上海),频次统计方法为标题或正文中出现“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报道篇数。

- ① 《县知事任用及试验新条例》,《时事新报》(上海)1913年12月7日,第5版。
- ② 参见孙家红:《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学科发展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 ③ M. G. Fawcett:《政治经济学》,龚自知译,《尚志》1918年第3期。
- ④ 汤漠森:《政治经济学之研究》,冯树华译,《时事新报》(上海)1920年2月5日,第14版。
- ⑤ 蒋宗昌:《经济学之由来与其意义》,《时事新报》(上海)1922年3月20日,第1版。
- ⑥ 《教育会演讲欧战状况》,《民国日报》1916年5月6日,第11版。
- ⑦ 《国民党实业演讲大会纪》,《民国日报》1924年8月12日,第6版。

经济学上所要求之收入上之弹性,决不能发生,即收入决不能大增也”;^①第四,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组织或社团活动介绍。如《时事新报》曾于1912年刊登一则政治经济学社的出版启事。^②该社出版书籍《中国财政论纲》《法政纲要》等,作者之一周棠有留日经历;再如1924年12月,《民国日报》两度报道政治经济学会与其他社团的联合活动。

自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以英文形式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一词以中文术语形式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可谓相当曲折和反复。在中国传统语义中,“经济”几乎是“政治”的同义词——经为经略、治理,与治同义,《左传》载:“礼,经国家,定社稷”;^③济为赈济、扶助,是古代政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同义,有时甚至直接用作成就政事之意,《后汉书》载:“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④前文提到,在西方原始语义中,“政治经济学”一词是自相矛盾的,故必须寻找特定的历史背景作为概念产生的调和环境;而在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政治经济学”一词是同义反复的,因此这一概念的产生必然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各自的指向出现了显著差异,而20世纪初西学特别是“西政”^⑤的深入传播、学科分工的细化等恰恰为其提供了条件。由此便不难理解,“政治经济学”概念缘何首先出现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分类中,而后才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

四、“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后,“政治经济学”译词的固定化,使中国知识界具备了较为统一、明确的讨论基础,其讨论层次也开始向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目标等方面深入,甚至逐渐超越一般的学术研讨层面,成为新一代有识之士构建和实现社会理想图景的新思想武器。在此阶段,苏联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中转站”,显著推动了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结合,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经济学界两大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

(一) 正名: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概念大多与追求平等、大同的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这从清末知识分子对“经济”一词的使用场景即可窥见一斑。例如梁启超在《清议报》发文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和经济革命之问题”,并对经济革命注解称,“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⑥再如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民生主义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⑦及至民国时期,有关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风潮愈发高涨。^⑧故“政治经济学”概念首先与之相联系,亦不足为奇。学者们开始将政治经济学称为“强国所必研究之学”,认为“社会主义一日未行,则此种方法一日不可或少”。^⑨他们还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介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或著作,以扩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其中受到多次推介的是法国合作主义倡导者季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

① 《中国财政现状》,《民国日报》1919年10月3日,第3版。

②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释义》,《时事新报》(上海)1912年9月9日,第1版。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2页。

④ 《后汉书》卷70《荀彧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83页。

⑤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这一阶段的独立出现,也与“政治”一词在同时期成为英文 Politics 的固定对译词有关。与“经济”类似,“政治”也是日文中的汉语借词,通过中国知识界的译介传入,同时也是最早出现于对欧美、日本分科体系的描述文字中,如1895年郑观应在介绍帝国大学的分科体系时提到:“法科分目二,曰法律,曰政治。”1912年,在严复倡导下,教育部正式用“政治”一词来统一此前的种种译名。参见孙青:《“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⑥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年第100期。

⑦ 孙文:《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1期。

⑧ 据统计,民初有突出政纲的35个党派中,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有11个,此外主张实施民生政策、社会政策的还有8个。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8页。

⑨ 冯树华:《政治经济学之研究》,《时事新报》(上海)1920年2月5日,第14版。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对于前者,戴季陶评价其是国家主义、社会连带主义、合作主义的典型代表;^①而后者也经报刊多次节译转载,并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源泉之一。1923年,《民国日报》特辟合作专刊,集中阐明了政治经济学与合作主义的密切关联,例如,“合作乃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发生”,“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问题,全恃国家的权力及各个有力的团体解决之”;^②倡导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根据自觉、自愿的合作加以实现,而合作的方法“在各种政治经济学中甚易搜求,如理想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等”。^③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衔接,自然为此后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衔接提供了铺垫;然而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巨变,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巴黎和会外交失利等事件的接连出现,使中国知识界的倾向和理论吸纳渠道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人们往往视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思潮为西方、日本舶来的产物,而“这种隔膜与沉寂的状况,自俄国十月革命起,为之一变”。^④另据统计,1919年以前,《新青年》上出现的“经济”一词大多指代与政治、文化相对的社会领域;而之后则主要用于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首先将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成中文,^⑥并先后派遣上千名各级干部赴苏联留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接收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政治经济学无一例外地被校方视为至关重要的课程。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所用政治经济学教材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拉皮多士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⑦这与1926年起留学于列宁学院的刘仁静、^⑧1935年东方大学校长赖特^⑨的表述亦完全吻合。除开设课程外,考虑到中国留学生的俄语基础较差,校方还组织部分师生创办翻译班、翻译经典著作,起初仅供教学使用,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翻译局或出版社等常设机构,从而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中国学界的传播进程。

在苏俄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政治经济学”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取代了李大钊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⑩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三部分之一的代名词。《时事新报》曾于1921年转译西方学者的评论:“政治经济学家多据马克思之妄言,而以贫民为与消费者绝对不同之仰人鼻息之人。”^⑪这从反面印证了时人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新认识。在1932年的一份公开出版的《大学投考指南》中,政治经济学科则被给予了如下解读:“自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发达以来,政治组织就和经济组织连合在一起。”^⑫这一陈述不仅证实了前文所述的学术分科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定型的作用,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对政治经济学内涵演变的关键影响。在此后的近20

① 季陶:《几德氏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建设》1920年第1期。

② 谢一鸣、张子石译:《合作之界说和定义(二)》,《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7日,第2版。

③ 谢一鸣、张子石译:《合作之界说和定义》,《民国日报》1923年11月3日,第4版。

④ 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6页。

⑤ 金涛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17页。

⑥ 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⑦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丁则勤译,陈庆华校,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4—75页。

⑧ 据刘仁静的回忆,他在苏联留学时修读的课程包括列宁主义、俄共党史、西欧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其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参见刘仁静:《往事漫忆——回忆1926到1929年》,《人物》1996年第1期。

⑨ 当时苏联东方大学主要开设联共(布)党史、革命运动史和共产国际史、政治经济学基础、列宁主义基础等课程。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⑩ 李大钊提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1919年第5期。

⑪ 魏而斯:《游俄观察谈》,正译译,《时事新报》(上海)1921年2月13日,第5版。

⑫ 卢绍稷:《大学投考指南》,勤奋书局1932年版,第70页。

年间,以张仲实、沈志远、艾思奇、柳湜等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家和马列著作翻译家,一方面通过在报刊等大众媒介推荐政治经济学相关著作,扩大学科影响力,其中以苏联学者的著作为多,如拉皮多士等的《政治经济学》^①、李昂吉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②等;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深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对象和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热潮。据《申报》报道,当时“有人愿以七折的价格,购买一本‘大众政治经济学’,一本封面撕破了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像这些年青人所流行爱读的书籍,是不会便宜的”。^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经意识到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讲授未必适用于中国。例如拉皮多士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材专辟版面讲述政治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苏联经济建设实践;^④再如刘仁静曾直言列宁学院的课程脱离实际,“只有死啃书本,学些一般的历史和经济常识”,却“没有提出如何把列宁主义应用于本国以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和社会党人等各国共产党所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⑤而赖特对东方大学教学情况的介绍也侧面印证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在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浪费了大量时间,主要是讲授的东西远不是所需要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既懂语言又了解国情的固定教学干部。”^⑥

在此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自觉开始了建构本土政治经济学的尝试。他们普遍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发现并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为任务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站在批判前者的立场上,“一方面完结了旧的资本阶级的经济学,一方面是建立了劳动者阶级的新的经济学”;^⑦然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显然不应就此止步。20世纪30年代,有关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广泛出现在各类报刊和著作中,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从学理上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回答在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建立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学者们所希望建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不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认识和批判,而要“研究每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法则”,^⑧“研究发展中的历史上的各社会生产制度”;^⑨从实践意义上,它应该肩负起“指示我们社会实践的方针”^⑩“给穷苦大众指出一条求解放的斗争的道路”^⑪的重大使命;从理论意义上,它应该克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种极端,“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⑫尽管受限于时代发展条件,近代中国知识界借助政治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实现自主理论创新的能力尚不成熟,但已经具备了以发展的、实践的立场看待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精神,这不仅为当时党的革命和宣传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也为1949年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分化:“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二元并立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正名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界统一的研究范式。20

① 民国时期,由拉皮多士和阿斯托罗维将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被多次翻译出版,标题略有不同。最早出版的是陆一远的译本《政治经济学》(江南书店1929年版),后又出版周维渥的译本《政治经济学》(东方书店1930年版)、张仲实等的译本《政治经济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吴清友的译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49年版)等多个版本。

② 李昂吉叶夫:《政治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9年版。

③ 慈云:《淘旧书》,《申报》1939年1月20日,第19版。

④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74—75页。

⑤ 刘仁静:《往事漫忆——回忆1926—1929年》,《人物》1996年第1期。

⑥ 《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81页。

⑦ 刘剑横:《谈一谈政治经济学》,《泰东月刊》1929年第9期。

⑧ 向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与任务》,《刀与笔》1940年第3期。

⑨ 李嘉德:《批评与介绍: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大路》1941年第3期。

⑩ 志今:《书报评介:介绍张译重订再版本“政治经济学讲话”》,《通俗知识》1937年第4期。

⑪ 吴梦殊:《书报述评:“政治经济学讲话”》,《读书与出版》1937年第24期。

⑫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世纪上半期,许多赴英、美、日等国留学的经济学者回国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学界、教育界的中坚力量,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多元视角和人才基础,并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欧美主流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的并存格局。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在不同工具书中的译法为例。在《经济学辞典》和《经济科学大辞典》两本辞典中,Political Economy 均被译为“政治经济学”,且其注解基本一致:“英国和法国的学者称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学者则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美国的学者则大都简称之为‘经济学’。”^①这两本辞典的编者均有赴日留学的经历,且熟稔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与瞿秋白等党的早期理论家有过接触,还有两位编者在成书之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周宪文编写的《经济学辞典》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辞条被同时列明,前者注解称,“在近代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皆不能完全脱却政治支配”,而马克思着眼经济关系是“为研究方便上之假定”。^②周宪文亦曾赴日留学,但与前述编者相比时间稍晚,回国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也更深,故其注解方式并不侧重于区分经济学说的不同流派,而着重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如果说上述三本辞典的注解虽略有差异,但基本译法仍属一致,那么1941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经济学名词》则与之大相径庭。该书将 Political Economy 和 Economics 均译为“经济学”,还特别加入了“Plutology”(富强学)的辞条,并将其也译为“经济学”。该书32位审查委员中,有28位曾出国留学,占总数的近九成;其中24位留学英美,占据绝大多数。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至20世纪初,西方主流学界已经完成了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概念的转变,经济学作为一门“纯粹”科学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业已实现;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和“富强学”无异,都是“经济学”概念演变历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一理念自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归国学者的知识体系架构,促使其将纷繁的英文术语统一定名为“经济学”。这一例证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的并存格局早在民国后期就已初见端倪,且二者在同一概念上的解读已经形成了不同范式间的显著张力。

这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1949年11月4日,教育部召开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强调“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理论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学习中要注意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同时“号召一向研究旧经济学的教授们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③此后,中国全面引进了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④为代表的苏联教材,将研究范式统一于苏联模式。在《大众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仅列明“政治经济学”辞条,并予以注解:“这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党性和阶级性。”^⑤此种情形固然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烙印,但更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进,其被动植入、自发生长的阶段已告一段落,逐渐步入了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的体系化发展轨道。

五、结语

自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的近百年时间里,“政治经济学”概念经历了混用、借用、化用、正名、分化等阶段,逐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与西方相比,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演变历程具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

① 柯柏年、吴念慈、王慎名编:《经济学辞典》,南强书局1933年版,第360页;高希圣、郭真编:《经济科学大辞典》,科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243页。

② 周宪文编:《经济学辞典》,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319页。

③ 金凤:《高教司昨召集座谈会 政治经济学教委会已组成》,《人民日报》1949年11月5日,第4版。

④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⑤ 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大众政治经济学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其一是对传统思想和学术体系的显著继承性。左玉河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特色是注重“通”,学术分类的标准往往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性质。^①这种通儒趋向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早期对富国、理财、生计等译名的举棋不定,还是化用学科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之学”作为概念术语,都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学科的认识是倾向于“通”而不是“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界限的划定未必是确定和清晰的——西方分科治学的迟滞显然也加剧了这种划定的困难性,然而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性质的认知是明确的,即从国家、制度的宏观层面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逻辑,进而寻求经济社会转型的要诀。

其二是对外来经济理论的高度包容性。与许多近代社会科学类似,政治经济学是源于西方的舶来品。而要使外来理论和概念体系真正落地于中国,仅仅依靠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选择性学习、辩证性吸收、本土化改造等长期的探索实践。值得庆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学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中转站”发挥了一定的转化功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主要经日本传入中国;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则主要通过苏俄(联)传入。与原生地欧美相比,日本、俄国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更加相似,面临的现代化转型任务也大体相同,这显著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的传播难度,缩短了其与实践相结合的转化周期。

其三是致力于解决近代中国现实问题的鲜明实践性。在“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知识群体从传教士、维新派迁移到革命派,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经济理论家,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指向也从合作主义、改良主义迁移到马克思主义,这与近代中国各社会阶级寻求救国方案的演变路径基本吻合。上述历程证明,“政治经济学”概念被引入中国,并逐渐被赋予丰富内涵,绝不仅是出于学术探讨上的目的,更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密切联系,也绝不是依赖于某一位学者、一类知识群体的努力,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高度适应性和指导性。

独特的学术传统与现实任务促使近代中国知识界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和发展路径。从学理上认知这一过程,既有助于发掘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传播、转化和重构的一般规律,也将为探讨政治经济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提供镜鉴。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Zhang Yaguang, Bi Yue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assive implantation to creative integration with native ideological traditions, and then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system.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ncept “political economy” had gone through a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translations, a borrowing of the concept “economics” and an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a closer connection with Marxism, opening up a path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ual paradigms in current economic research, and discussing the trend and mis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 History, Modern China, Marxism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左玉河:《从“经世之学”到“分科立学”——近代早期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